

早期农耕文明中的“二十四节气”的表述形态 与理念构建研究

程万里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6)

【摘要】“二十四节气”随着先民观象授时、时空合一、阴阳五行、自然崇拜等观念衍生而出,其作为思想和观念的物化载体,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文化现象。中国的古代历法属于阴阳合历,就是以朔望月与太阳年并行为基础的历法,首先他们通过平分两分日的距离很快找到了两个至点(冬至与夏至),而后通过平分四时(冬至、春分、夏至、秋分),找到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接着他们把八节之间的距离平均三分,定立“二十四节气”。可以说“二十四节气”源起于天文观测及农耕时间的需求,从最初的春秋,到四季演化形式,到与方位、四季以及物候的融和,逐步趋向完善,并最终成为中华农耕文明的时序体系,默默地指导着中华大地的农业发展和生活的次序。

【关键词】农耕文明; 二十四节气; 演变; 理念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2)06-0040-10

A Research on the Form of "24 Solar Terms" in Early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CHENG Wan-li

(School of Art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Abstract: With time-based observation of the ancestors, the unity of time and space, the five elements of yin and yang, and nature worship, "24 Solar Terms" as a physical carrier of ideas and concepts, which eventually developed into a universal guiding cultural phenomenon. The ancient Chinese calendar belongs to the lunar and solar calendar, which is based on the parallelism of the lunar and solar years. Firstly, they quickly found two points of arrival (winter and summer solstices) by equally dividing the distances between the two days, and then found the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by equally dividing the four seasons (winter, spring, summer, and autumn equinoxes).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originated from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 and the demand of farming time, from the initial spring and autumn,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four seasons, to the integration with the directions, the four seasons and the weather, and gradually became perfect, and finally became the chronological system of Chinese farming civilization, silently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he order of life in the Chinese land.

Key words: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wenty-four solar terms; evolution; idea

中华文明作为古代世界的四大文明之一,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体系。同时,中华文明也是最早

【收稿时间】 2022-07-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类重点项目“中国祭祀图像的历史重构”(20AF008)

【作者简介】 程万里(1976-),男,文学博士,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艺术学理论,美术学。

进入农耕文明的区域,并且形成了璀璨鲜明的中华农耕文明体系。中华农耕文明是先民在与自然环境斗争中而逐步形成,与中华文明特有的地理环境分不开,作为文明发源的两条母亲河“黄河、长江”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的“东西走向”的河流,这样使得两条“母亲河”的上游与下游处在同一维度,在季节更替时有着相同的景象。因无法像其他文明那样顺河向南方温暖的区域进行迁徙,进行采集果实与狩猎,古代先民为了渡过寒冷的万物萧索的冬天,必然定居进行农业生产,储藏粮食,从而产生出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形成,迫使先民更加注重对天象更替与气候变化的记载与总结,这不仅是农业发展的需要,更多也是族群生存的需要,这也是“二十四节气”能够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中具有指导意义存在的出发点,并与中华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时序体系,其在农耕文明中对生产和生活的指导意义具有不言而喻的标准性与规范性的功用。“二十四节气”是随着先民观象授时、时空合一、四方四风、自然崇拜等观念衍生而出,揭示着气候、水源、寒暑等自然资源对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本质条件,并作为思想和观念的物化载体,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文化现象。

一、观象授时

恩格斯说:“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天文学。”^①可以说,自远古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计时方法都必然源于天文,而农业文明必然是天文学发展的强劲推力。

张闻玉说:“二十四节气是由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决定的。现代天文学把地球公转一周一年分为四段,划周天为360度。自春分开始,夏至为90度,秋分为180度,冬至为270度,再至春分合成360度。每一段每相距90度又分为六个小段。这样,一年便分为二十四个小段,每段的交接点就是二十四节气。西方至今还只有两分、两至,仅具有天文意文。可以说,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特有的表达农业气象条件的一套完整的时令系统。”^②那么,“二十四节气”是不是简单的太阳历的产物?这与中国传统“观象授时”是否有所区别?与我们常说的作为农历的“二十四节气”是否有所出入?这都需要我们去挖掘已有的传统,探究“二十四节气”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从表述形态与理念构建呈现“二十四节气”的变迁演变,揭示“二十四节气”与先民日常生活实践的关系。

《尚书·洪范》写道:“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③这里可以看到,日月星辰的变化移动,在先民眼中直接关系到季节的更替和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冷暖干湿又左右着植物的生长周期。先民们经过长期的精心观测后发现,日月星辰的变化实际上都忠实地遵循着各自的规律。这个发现让古人找到了确定时间的准确标志,于是便采用“观象授时”的方法来确定时令季节、制订历法,逐步建立起自我的时序体系^④。应该说“二十四节气”的形成源于原始先民的“观象授时”模式。

从观测一颗星开始,到逐步观测头顶整个星空,正是“观象授时”的发展历程,并终将其建构成相互关联的体系,成为天文学的发端,也是整个农耕文明社会时序的开端。如今的天文观测,北半球的天空,北极星是恒定的标准点,其常年可见使其成为与其它星宿最好的联络基点,而位于其旁的北斗七星与之形成了最为密切的关联。《尔雅·释天》:“北极谓之北辰。”郭璞《注》:“北极,天之中,以正四时。”^⑤由于岁

① [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页。

② 张闻玉:《中国古化天文历法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9页。

③ 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82页。

④ 程万里:《汉画四神图像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页。

⑤ [晋]郭璞、[宋]邢昺疏:《尔雅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7页。

差的缘故,北斗的位置在数千年前较今日更接近北天极,常显不隐,观测起来十分容易,成为终年可见的时间指示星。为了更加便于观测,古人把北斗七星中的每一颗星都命了名。《春秋·运斗枢》云:“第一天枢,第二璇,第三玑,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标,合而为斗。”^①北斗围绕北天极所作的周日或周年的旋转,很像天盖上环绕天极旋转的钟表指针。先民们根据斗柄和斗魁的不同指向,确定北斗与寒暑季节变迁的关联,创立了“斗建授时”。这种通过观测斗杓的古老方法,使得夜间某些恒星的出没或位置变化更便于识别。实际上,四大发明中“司南(指南针)”为什么是个勺子形状,便是对北斗七星的物状形态的模仿。这种计时方法简易而实用,它的具体做法在《夏小正》中曾被反复提及:“正月,斗柄悬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斗柄悬在下则旦。”^②《鹖冠子·环流》对此也有类似的记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③不仅如此,人们还以此来确定方位。《淮南子·齐俗训》云:“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④

詹鄞鑫先生在《神灵与祭祀》一书中认为:“(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前)星辰崇拜是笼统的,人们只是把星辰当做天神的存在形式来看待。随着天文历法的发展,有些星座在指示生产季节等方面的价值越来越显著,才逐渐受到单独的崇拜。”^⑤随着古人观测水平的提高,利用北斗决定时间的方法逐渐得到了完善。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对此有所概括:“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⑥之所以被命名为“帝车”,源自直观的视觉关联。农业的发展使得对农时季节的确定需要更高的标准,只是单纯地依靠斗柄在上、在下已经不够了。因此之后就出现了通过观测某几颗一定的明亮的星宿(如鸟、火、虚、昴等)在傍晚或平明的出没和南中(过子午线)的时间,来决定季节并制订比较准确的历法。《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土,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鹖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⑦“日中”“宵中”指昼夜平分,即春分、秋分。“日永”即昼长夜短,指夏至。“日短”,即昼短夜长,指冬至。春分之日,昏七星中,七星是朱雀七宿的第四宿,所以说“日中星鸟”;夏至之日,昏心中,心宿又名大火,所以说“日永星火”;秋分之日,昏虚中,所以说“宵中星虚”;冬至之日,昏昴中,所以说“日短星昴”。日中、日永、夜中、日短,显示了一年中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大节气,划分出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气候,包含着自然景象和人们耕作、休息、寒暖等生活内容。但《尚书·尧典》所说的四时不是我们所指的春夏秋冬四季,而应为二分与二至。这里明确指出,以观测鸟、火、虚、昴这四颗星在黄昏时正处于南中天(即过子午圈)的日子定出“二分二至”作为划分季节、农时的标准,并已经出现每年约366天的以闰月来调整的阴阳历^⑧。有了分至点的划分,人们就可以按照时间来安排耕作与收获。古人的分点的观测是建立在对大火星和参星的观测上的。先民们发现,初见大火星于东方时,与农时的春分时间接近;而大火星在夜空消失,位于黄道另一端的参宿取代大火星见于东方时,正是秋分时

① [汉]司马迁:《史记》, [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72年,第1291-1292页。

②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25页。

③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125页。

④ [汉]刘安:《淮南子》,诸子集成·七,中华书局,1954年,第173页。

⑤ 詹鄞鑫:《神灵与祭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2-33页。

⑥ [汉]司马迁:《史记》, [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第1291页。

⑦ 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4页。

⑧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8页。

节。《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①商星也叫辰星，即指大火星。杜预《集解》：“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星，大火也。”^②大火星即东宫苍龙七宿中的心宿二。参星则是《史记·天官书》中所讲的白虎。按照当时的实际天象，参商二星恰好分别处于春分和秋分两个分点上，授时标志十分明显^③。这清楚显示出大火与参星在古人观象授时中的重要意义。中国的古代历法属于阴阳合历，就是以朔望月与太阳年并行为基础的历法。参商二星作为二分点的确立，也令四中星的观测逐步发展完善起来，这对四季的划分至关重要，也应该说是“二十四节气”发展的起点。

二、四方四时

“观象授时”的建立使用，使得在时间角度，北斗成为“观象授时”的主要星宿。而在空间方面，星区划分的“二十八宿”与北斗的相互联系则使其沿赤道组成了四个象限宫，即东宫、西宫、南宫和北宫。月亮在恒星间的运动的周期是27~32天（恒星月），于是古人把赤道附近的天空分成二十八份，这就是二十八宿。（取二十八，是由于它既近于恒星月的日数，又可被四除尽便于分成东西南北四个区域。）^④二十八宿的形成是通过观测昏旦星象、间接推出太阳位置来定时令季节发展而来的，因此保留了一部分离赤道较远但自古为观象授时所用的几个主要星象。二十八宿及现有的这些名称是经过历史上多年的演变而逐渐完整定型的。二十八宿的形成与观象授时时所取星象一脉相承，不能把它们分开。在早期，由后世东、西宫中的部分星象组成的东、西两宫似乎受到了特别的重视，而较之更早的年代，人们已经具有地理上的四方观念^⑤。

甲骨文里有合写的“四方”，也有分开来的“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它们都是“禘”祭的对象和风的住所。这从两块罕见的甲骨上可以看得十分明白。

一是武丁时期的牛胛骨记事刻辞，收于《甲骨文合集》第14294版，释文如下：

东方曰析，风（风）曰协；南方曰因，风（风）曰微；西方曰夷，风（风）曰彝；北方曰纪，风（风）曰协。

一是祈年刻辞，收于《甲骨文合集》第14295版，释文如下：

辛亥，内贞：今一月帝令雨？四日甲寅夕……。一二三四
辛亥卜，内贞：今一月[帝]不其令雨？一二三四
辛亥卜，内贞：禘于北，方曰□，风（风）曰役，祓[年]？一二三四
辛亥卜，内贞：禘于南，方曰微，风（风）[曰]遲，祓年？一月。一二三四
贞：禘于东，方曰析，风（风）曰协，祓年？一二三[四]
贞：禘于西，方曰彝，风（风）曰□，祓年？一二三四
此外，《合集》第30260版记载有：其宁风于方。
《粹编》第1545版记载有：其宁雨于方。
《合集》第30258版记载有：其宁风，方……大吉。

可见，甲骨文卜辞中常见求年、求禾、祈方宁雨、向方求雨或祈方宁风的记载。“宁”是为避免自然灾

① [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96页。

② [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1198页。

③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184页。

④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第22页。

⑤ 程万里：《汉画四神图像研究》，第31页。

害,祈求风调雨顺,可以看到祭祀四方更多的目的就是为了祈求给农业带来丰产丰收。当然“风”和“方”也经常分开祭祀,有时指明方位、附加方名^①。明辨四方在殷人的生活中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它不仅关乎宗教(隆重的祭方之礼),也关乎兴邦邑、建陵墓、促生产、固生活的实际需要,所谓知方而务事,通神而佑人。这里四方观念有着双重意义的指向,既有方位的指向,又不是纯粹的四方观念,而是四方、四季相融合,并衍生出四方的名称,就是四季轮转的农业时序的思维体系。根据殷墟遗址的发掘,殷人的宫室、墓室的修建都要求选择和测定方向。常正光指出,殷人在同一天,既祭“出日”又祭“入日”,“应该说是宗教活动掩盖下的测定四方的科学工作,实测出出日与入日取得东西线所依据的两个点,有了东西线才得到南北方向的引线”。还指出,测定四方具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中之一,只有测定四方才能观象制历、判知四时。“度四方”是“定四时”的基础^②。

殷代的四方风反映了殷代分至四气及其时的物候现象,是殷人独立的标准时体系。卜辞中有东南西北四方神名和四方风名,却没有标志时间循环变易的四季之名。对此杨树达先生指出,四方名与草木有关,“其与四时相互配合,殆无疑问,然甲文未明记四时之名也”^③。李学勤认为,“实际上四方风刻辞的存在,正是商代有四时的最好证据”,四方名“析、因、彝、伏”本身“便蕴含着四时观念”^④。萧良琼也认为,“四方反映了四时观念”,四方风是四季的标志^⑤。其实,四方为空间意识,“四方风”则在很大程度上报告了殷人朦胧的时间意识。殷人是在对四方风的命名中渐次萌生了只有在后来才有的春夏秋冬四时观念。在后来成为主流学说的“五行说”始基因素的“四方说”中,四时观念是蕴含在四方观念之中的,四时是通过四方风暗示性地反映出来的。这些都可以这样理解,“方位”“四时”在古人心目中具有着重要和显著的位置。

一般来说,方位包括两类:一类是绝对方位,如东、南、西、北、中;还有一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的相对方位,如前、后、左、右、上、下。四方的方位定向并非随意制订,而是具有严格的经典定制的。《礼记·曲礼上》云:“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⑥《尚书正义》云:“东方成龙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鸟形,北方成龟形,皆首西而东尾。”^⑦四方的方位定向为:前朱雀南、后玄武北、左青龙东、右白虎西。当它们共同位于一个平面时,则是:上朱雀南、下玄武北、左青龙东、右白虎西。参看其他诸种被世人奉为圭臬的经典古图,其向、位、序是如此排列的。先天八卦图:上乾南、下坤北、左离东、右坎西。后天八卦图:上离南、下坎北、左震东、右兑西。河图:上二七南、下一六北、左三八东、右四九西。洛书:上九南、下一北、左三东、右七西。可以看出,四神图像与先天八卦图、后天八卦图、河图、洛书等经典古图的向、位、序大体一致,不同图的不同之处,主要是在相同的向、位、序的结构中,所取的象天应地言事的对应符号系列有所不同。董仲舒《五行之义》云:“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⑧《白虎通义·五行篇》云:“水位在北方。……木在东方。……火在南方。……金在西方。”^⑨实际上,不仅五行,还有五帝、五德、五音、八卦、十二支、二十四节气等等各种符号系统,都被分别配以这种恒定的向、位、序

① 萧良琼:《从甲骨文看五行说渊源》,见于艾兰等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学说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3页。

② 常正光:《阴阳五行学说与殷代方术》,见于艾兰等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学说探源》,第246、251、255、256页。

③ 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杨树达文集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7页。

④ 李学勤:《商代的四风与四时》,《中州学刊》1985年第5期。

⑤ 萧良琼:《从甲骨文看五行说渊源》,见于艾兰等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学说探源》,第224-225页。

⑥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74页。

⑦ 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4页。

⑧ [汉]董仲舒著、[清]凌曙注:《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76年,第391页。

⑨ [清]陈立撰、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第167-168页。

的结构,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有机的、动态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的中国式的数学模式。并且,在这个模式的构思初期和演进过程中摈弃了虚拟理法,其格局具有实际生活的应用性,却也因此一下子就形成了天地一统、包罗万象、应于万事、四时轮转的大系统。可以说,无论“二十四节气”和其他要素如何对应匹配,都是建立在四时四方方位观念的基础之上的,是对时空内涵的拓展与延伸。

古人进行恒星观测,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确定天体在天球上的位置。这种要求导致了一系列坐标体系的产生,主要有地平坐标、黄道坐标、赤道坐标和银道坐标^①。其中地平坐标系统产生最早同时也最为直观。地平方位的概念在地平坐标系统建立的初期便占有重要地位。地平方位也就是地平方向,可以在地平经圈上加以标示。方位概念产生于东、西、南、北四个正方向,通过测量日影的方法直接取得。由于先民的世界对太阳的依赖性最大,太阳对人间的作用力最强,故先民们以朝向太阳为定向基准。《皇极经世书·以运经世观物理》云:“天之阳在南,而阴在北。”^②此中所谓天之阳者,自然是以中原广大地区为基准。中国的中原地区处于地球北纬30至36度,距离太阳夏至最北端北回归线尚北偏两千公里。冬至太阳垂直于南回归线时,正午太阳对中原地区的角度南偏达60度左右;夏至时太阳到达最北端,正午太阳对中原地区仍南偏5度左右。所以一年四季,太阳总是在中原地区的南天作远近的位移。因此,古人把南定为前方、上位,把北方定为后方、下位。与今天不同的是,早期的方位概念指的并非某一个点,而是一个区域。

至此可以说明,商人的观念中初步形成了四方方位意识,更有意思的是,其中还包含了时间因素。众所周知,人类的方位意识是在太阳的启示下发生的,人类对方位的测定即源于日影的变化。在早期的社会中,先民主要的工作是采集与狩猎,这使得太阳成为人民生活中具有极大影响的事物,日升日落,决定着植物的生长以及相应的收成,动物也是同样,雨水繁多必然影响牧草的生长,影响狩猎的收成,这使得太阳成为每日必然的观察对象。如果我们把一年中每一天太阳东升时跃出地平那一瞬间的日影记录下来,再把这天太阳西落时没入地平之前一瞬间的日影也同样记录下来,那么两个日影记录重合的时间就只有春分和秋分。这意味着二分日时,太阳升起的位置是正东方,而日落的位置则是正西方。因此,测量日影不仅是古人辨别方位的需要,与此同时,正是这种需要使他们客观上很容易便认识了两分点。也就是说,两分点的测定与古人确定方位的做法密切相关。一方面,体现了太阳运行至东、西两方或东、西、南、北四方的方位概念。另一方面,这种测得两分点的古老做法,导致了后来四时八节与方位的结合。春分和秋分,日出正东,日没正西;夏至日行极北,其后南移,冬至日行极南,其后北归,所以二分二至各主东、西、南、北。《尚书·尧典》记载分至四神分居四方之极,掌管四时。商代甲骨文至汉代的文献都明确反映了这一传统。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分至四中气与四季在早期是彼此分离的,它们的先后建立可能源于两个互为独立的体系。分至是借助圭表直接测得,因而成为建立太阳年的时间标记点,通过殷卜辞对四方风的记载能够系统地追溯出来。而四季的名称与农业密切相关,本于农业周期,其与农业周期的联系也可以通过对季节名称的研究得到清楚的反映^③。不仅如此,四季的划分是以分至四气为基础。农业季节作为早期的季节周期,强烈地适应着农作物的自然生长期,而四气的确立则适应着授时正位的需要。两个体系的最终结合便是四季的形成之时。分至四气以及后来二十四节气的产生,严格地说都是依据天文学标准平均分配的结果^④。首先他们通过平分两分日的距离很快找到了两个至点(冬至与夏至),而后通过平分四时(冬至、春分、夏至、秋分),找到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接着他们把八节之间的距离平均三分,定立

①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6页。

② 《皇极经世书·以运经世观物理》,《四库全书·子部109·80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78页。

③ 冯时:《殷卜辞四方风研究》,《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冯时:《殷代农季与殷历历年》,《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

④ 竺可桢:《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34-254页。

二十四节气^①。汉武帝太初改历时曾下诏云：“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则上矣。”^②应劭注曰：“言黄帝造历得仙，名节会，察寒暑，致启分，发敛至，定清浊，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气物分数，皆叙历之意也。”郑玄曰：“合，作也。帝作历，历终而复始，无穷已也，故曰不死。名春夏为发，秋冬为敛。清浊，谓律声之清浊也。五部，谓五行也。天有四时，分为五行也。气，二十四气也。物，万物也。分，历数之分也。”^③《易纬·乾凿度》云：“天气三微而成一著。”郑玄注云：“五日为余，十五日为著，故五日为候，十五日成一气也。”^④先民们用节气记时注历，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分至四气无疑是最早诞生的四时，而建立这些气点的最初目的则是确定标准时间和方位。《礼记·祭义》：“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内外，以端其位。”^⑤春、秋分太阳出没正东、正西，可以正东、西位；同样，冬至日南至而影极长，夏至日北至而影极短，可以正南、北之位。四个标准点的确定，客观上得到了回归年的长度。《春秋繁露·四时之副》言：“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⑥当先民用“四方风”去隐喻地反映四时观念的时候，空间虽也面临时间化，但更主要的是，时间具有被空间同化的可能。因为古人是以理解空间的方式去理解时间，四时的观念必然带上四方观念的色彩，具有了由四方风的隐喻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类似于空间观念的结构和特征。通过四时四方的整合，“二十四节气”的确定，天下万物形成了一种互为关联的有机整体，人与万物都在同样的生命之流中迈进。这种以时间与空间合一为特点的时空观所体现出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则是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源头之一，也成为“二十四节气”体系的重要特征。

三、物候指向

中国文化发源于农耕文明，由于农业与天象气候的重大关系，很早就产生了东方特色的天文学观念与知识，但是，由于先民祭祀文化的发达以及强大的统治阶层威慑力，天文学除历法之外几乎同时又成了宗教神学的附庸，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与征伐、祭祀乃至衣食住行都有了神秘的对应关系。《易·系辞》云：“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⑦表明已产生天象与人间吉凶有关联的观念。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道：“夫，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不可失也。’”^⑧由此可见，不仅时天人合一的观念在先民们的意识中早已显而易见，先民们更把时间与空间都视为感性具体的存在，可以称之为“具象的时空观”。这种观念在“二十四节气”体系发展中的重要表现是融入了具体的物候特征。

皮亚杰认为：“全部认识都以一个机体结构为前提”^⑨“我们的根本出发点是：一切认识，甚至知觉认识都不是现实的简单摹本，因为认识总是包含着融于先行结构的同化过程。”^⑩这里所提到的“机体结构”“先行结构”，指的都是“图式”。人类的认识“图式”确实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到最后

① “节”与“气”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最早出现的分至四时都属于“气”，启闭四立则属于“节”。

②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975页。

③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第976页。

④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214页。

⑤ 王梦欧注译：《礼记今注今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13页。

⑥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明]程荣：《汉魏丛》，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5页。

⑦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36页。

⑧ [汉]司马迁：《史记·历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0页。

⑨ [瑞]皮亚杰：《生物学与认识》，尚新建、杜丽燕、李渐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4页。

⑩ [瑞]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页。

总是达到一种稳定的状态。人类的认知“图式”,最基本的莫过于人类的时空观了。因为时空观不但决定了人类对客观事物用何种方式进行感知,还决定了人类的因果关系等观念的形成,决定了人类对感知结果进行推理的过程。无论是从人类这个类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人类个体的角度出发,我们都可以看到,时空观念确实有一个不断发生、发展的过程,并且,这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总是在一定的阶段上趋于稳定的状态。这种稳定的状态,就是人们普遍具有的三维空间知觉和一维时间知觉,而这种知觉必然随着个人头脑中的图式进行变迁。所以,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同时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人文性^①。

《周易·系辞下》云:“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于地。”在“二十四节气”除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表现时间转变的节气,还有雨水、惊蛰、清明、谷雨、小满、芒种、小暑、大暑、处暑、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小寒、大寒等植物、动物、气候等变化的节气。这些都是先民在自然实践观察中得到的体验与知识,并逐步演变成成为生活的规律与指导。不仅如此,随着农耕文化发展需求,“二十四节气”逐渐完善。以往先民们一般通过自己的感觉直接解释“对象”,认识对象。他们基于生存本能和功利的目的,利用直感的“相似”与“同一”把事物区分和联系起来,力求在无序的世界里建立有序的观念系统。

先民们对“二十四节气”的认识,使得“二十四节气”包涵出与社会文化同步的宇宙意识与社会理念,使得“二十四节气”开始包含四时的物候特征和四方的空间意识。《淮南子·天文训》:“何谓八风?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条风至四十五日明庶风至,明庶风至四十五日清明风至,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景风至四十五日凉风至,凉风至四十五日闾阖风至,闾阖风至四十五日不周风至,不周风至四十五日广莫风至。”^②可见古人认为,风为震物之气,不同季节的风导致产生不同的物候征验。风由一方吹来,对雨量、收成有着不同影响,让古人敬畏风来的“方向”,如同日出日落之所。虽然“八风”未与“节气”内涵融合,但是可以看出先民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对风向的观察,以及对身边事物的变化感知。如: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都是一年中降水情况的记载总结,这里可以看到在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对降水的强烈需求,也导致近三分之一的节气与降水有关;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都是温度的变化记载总结;惊蛰、清明都是动物、植物的变化记载总结;小满、芒种都是农忙情景的记载总结。从“二十四节气”的布局,也可以看到春来一雷动一雨至一万物生长一收获的时间循环,前十二个节气看到生长旺盛的过程的农忙时节,后十二个节气看到收获储藏的过程的农闲时节,虽然这些事物的记载总结并不是一类,却告知了先民在不同时节应该作何具体的农耕事情,这也是“二十四节气”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绵延不断的根本动因。至今,在许多的乡村,依然秉承着“二十四节气”轮换的周期的时间理念,虽然有了许多反季节的农业种植出现,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还是保持着固有的节气的时间经验,还是保持着与农耕文化同步的文化理念,传递着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信仰。

四、理念延展

“二十四节气”的确立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与文化理念在生活场景中的展演。在历史祭祀形态中,仲春亥日的“亲耕礼”需要皇帝亲自参与,并进行劳作,而且皇后需要作纺织的劳作,都呈现出古人“重农”思想,以及对时间的遵守,对“二十四节气”的遵守,期望上行下效,推动农耕文明中“男耕女织”的社会最佳结构,也盼望今岁风调雨顺,丰收富足,这样才能使得社会稳定,人们安居乐业,生活富足。这也是农耕在古代社会始终占据首要位置以及如今所说的“小农经济”的由来。

首先,“二十四节气”作为典型的传统文化中的理念构成,反映出古人对时间与物体成长之间关系的

^① 程万里:《汉画四神图像研究》,第32页。

^② 何宁:《淮南子集释》,第195-199页。

思考以及对思考结果的理念传达。在当代文化史的研究中,关于“二十四节气”仍长期处在“物象形态”的讨论阶段,忽视了其原有的时空功能与社会功能。“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农业时间观念的产物,并根据时间的变换而调整,呈现出古人对自然科学的尊重与遵循,也是先民由实践观察积累而成的文化理念,从而建构出天地运转的宇宙形态,使得农业社会有了明确的指导方向和运行规律,并呈现出自我特有的时空准则与信念,展现出农业社会的伦理纲常。

其次,“二十四节气”被联合国认定为非遗之后,进入一个研究的鼎盛时期,出现众多的研究论文与绘制的艺术作品。如何能够准确表达“二十四节气”的文化内涵,是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是不是每个时期的物候图像,便能够呈现顺应天时的“二十四节气”的内涵?这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在如今,许多日常食用的蔬菜,属于反季节生产,或者全年都可以吃到,这些还是“二十四节气”理念下的产物吗?是不是新的文化形态或者是新的文化理念指导下新的生活方式?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第三,“二十四节气”是先民观察积累而成的时间、空间与农业生产理念,且具有普遍的意义,在民众生活中即使在如今都有着指导意义,这也是农业文明形成的特殊文化理念,在中华文明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应该成为研究者重点研究的问题,有着极高的审美与文化价值。

如上文所述,还可以看到甲骨文中“风”作为“凤”,也可以看到鸟与风之间的神秘关联,这也是物候指向中鸟的出现、鸣叫作为节气物候象征的关联,进而可以联想到中国饮食文化中“筷子”餐具,就是模仿鸟的嘴巴进食而创造出的工具,其型上圆下方,植入古代“天地”理念,而吃饭用的是“圆的”这头,可以解释“靠天吃饭”的由来,包括后来“风神”“羽人”等神灵形象的构建,以及审美上“优美”的确立,这些都与“风”作为原始朴素的农耕理念有着密切关联,刮什么风,预估什么物候的到来,使得“风”或者后来“二十四节气”的形成,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活、生产甚至审美理念的构建。

更加具体的理念延展在传统节日中也有所展现。如中国的古代四大传说之一“牛郎织女”的故事,也特指“七夕”节日,“七夕”一般在“立秋”前三四天,实际上也是对“农耕文明”和“相应节气”的文化理念的延展。无论是“牛郎”,还是“织女”,都是对“男耕女织”主题的直观表达,主要的故事情节“洗澡、成亲,老牛去世、上天追妻、银河、一年一见”都是直观表达农业社会中许多事物的理念与形态,也展现了爱情神话的魅力与门第之见的遗憾。司马迁《史记》曰:“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①“日月五星”作为古代天文观察主要客观对象,可以见到“七”也是天文星象的思维结果,而且“七夕”正是南方水稻成熟的物候。《太平御览》引《日纬书》:“牵牛星荆楚呼为河鼓,主关梁。织女星主瓜果。”^②就可见“七夕”与农业丰收有着直接关联。《荆楚岁时记》记载:“七夕,妇人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钹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蟪蛄(蜘蛛)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③《开元天宝遗事·乞巧楼》:“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④《东京梦华录》:“七夕以小板上傅土,旋种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态,谓之曰:‘谷板’。”^⑤可见“七夕”理念的延展。而“七夕”处于小满、秋分之前,是中国中原地区,秋收之前的一个重要时期,是人们期盼丰收的关键时期,在祈求丰产的愿望下,举行仪式是不可缺少的。古代江南地区,在水稻扬花灌浆时节,有夫妻到田头过性生活的习俗。这些都说明节日是农耕文明特定日期的确立,与“二十四节气”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与如今宣传“七夕”成为“东方情人节”有一定的出入。

① [唐]房玄龄等著:《晋书·天文上》卷一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288页。

② [宋]李昉:《太平御览·时序部》卷十六,中华书局,1960年。

③ [梁]梁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7页。

④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8页。

⑤ [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年,第208页。

结 语

“二十四节气”在西汉完整组合出现以前,是以天象观时为发展主线,这与先民观测辰、参二主星进行授时的文献记载相吻合,同时也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相一致。通过对“二十四节气”流变过程的讨论和归纳,可以发现,“二十四节气”乃由“二生四”而后“由四而演变为二十四”,即时间与空间的合而为一。通过四时四方的整合,天下万物形成了一种互为关联的有机整体,人与万物都在同样的生命之流中迈进。这种象征思维表现为一种建立在“天人合一”之上的观念,把四季、四立、降水、气候等本不相类的事物放在一个人文建构的图式中加以整体的、浑沌性的把握,使本来无秩序的宇宙有序化。

所以说“二十四节气”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而是一种经过价值判断和优胜劣汰的选择后对现在仍然发挥重要影响的历史元素存在。它们常常通过“物”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物”提供了一个窗口或视角,从中可以窥见古人在应对自然、经营环境、运用技术、表达情感或阐释理想等方面呈现出的文化选择、生活观念这样一些重要的深层的领域,以及其所相关于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和符号的意义维度等。在以多元化、交叉性为学科发展态势的今天,如何展开综合研究,反思和继承传统,寻找传统与现代的精神关联,从标榜硬质形式的“艰深晦涩”回归到基于对生命和生活的一种尊敬,从牺牲功能与结构的合理性转向构筑幸福、愉悦人生的生活模式,才是最终的根本要义。“二十四节气”关心的是“物”的生产、人的行为与环境的紧密关联程度——追随自然的演变以及协同生产、生活与生命所能够形成的一种不可分隔、难以分类并密集混合的综合状态。可以说“二十四节气”源起于天文观测及农耕时间的需求,从最初的春秋,到四季演化形式,到与方位、四季以及物候的融和,逐步趋向完善,并最终成为中华农耕文明的时序体系,默默地指导着中华大地的农业发展和生活次序。

(责任编辑:徐定懿,黎海明)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 中国天文学史[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 [2] 冯时. 中国天文考古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3] 张闻玉. 中国古天文历法讲座[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4] 程万里. 汉画四神图像研究[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